

由街頭走向國際：臺灣文學刊物 《陽光小集》中「菲華詩展」 的意義與價值*

侯 建 州**

摘 要

自1982年起，臺灣「陽光小集」與菲律賓「耕園文藝社」結盟，為國內首度與海外文藝社團締結聯盟的詩社；而《陽光小集》詩刊共計發行十三期，竟有連續六期「菲華詩展」，如此高規格的跨國合作，在臺灣解嚴前的現代詩刊，可謂絕無僅有。臺灣文學中的華語語系文學曾與菲華文學關係密切，若以此為線索，也是另一條與世界共振的發展機緣。進一步整理《陽光小集》「菲華詩展」的作品，發現其中已有部分詩作呈顯有別於臺灣文學題材的菲律賓在地經驗，展現菲律賓在地特色的主題、用語，具有「回歸現實」傾向，與臺灣文學思潮合轍。本文之探究，亦是將臺灣文學思潮放入國際華語語系加以考察，思考其在地與國際雙向視野與實踐的經典範例。

關鍵詞：菲華文學、華語語系、王國棟、吳天霽、謝馨

2024.01.23收稿，2024.05.23通過刊登，2024.06.02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場域的視角思考華語語系研究中的臺菲文學交流：論臺灣在謝馨成為菲華經典作家的位置與意義」（MOST 110-2410-H-507-009-）的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的意見，以及編委會給予的修訂建議，使本文論述更為周延，謹致謝忱。修訂未盡之處，當由筆者自負文責。本文初稿曾於2022.10.15-16，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2022臺灣文學學會年會「世界中的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

**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Philippine Sinophone Poetry Exhibition”
in the Taiwan Literature Journal
Sunshine Collection

Hou, Chien-Chou*

Abstract

The "Sunshine Collection" Poetry Society, which publishes *Sunshine Collection*, was once positioned as a street movement for modern poetry or, symbolically, a street movement for Taiwanese literature. Since 1982, "Sunshine Collection" has been allied with the Philippine "Cultivation Garden," making it the first poetry society in Taiwan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an overseas literary society officially. *Sunshine Collection* has published a total of 13 issues, including six consecutive "Philippine Sinophone Poetry Exhibitions," which were unique among Taiwan's modern poetry magazines prior to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Sinophone literature within Taiwanese literature once shar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hilippine Sinophone literature, forming anothe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that resonates globally.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works of *Sunshine Collection* and the Philippine Sinophone Poetry Exhibition, we can observe that some of these poems align with Taiwan's literary trends by "returning to reality" 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theme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ippines. These traits stand in contrast to the mainstream subject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the tim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aiwanese literatu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inophone literature, considering its two-way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as a classic example of such interactions.

Keywords: Philippine Sinophone Literature, Sinophone, Ong Kok Tong, Tianchee Go, Grace Hsieh-Hsing

一、華語語系·臺灣·菲律賓

詹閔旭回顧史書美、王德威兩位論點有所交鋒的主流華語語系論述，指出兩人皆在意的「在地性」仍是以（相對於中國的）單一地方為主，反而可能將華語語系限縮在「中華性vs在地性」的二元對立框架，難以開展。是以該文借鑒並回應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對於以單一在地性連結形成的跨國華語語系想像批判，提問除了中國vs香港、中國vs新加坡、中國vs臺灣等二元框架，我們如何想像華語語系不同地方之間的跨國連結，例如香港與臺灣之間的關係為何？是以該文提出「多地共構」的思考，並以馬華文學的臺灣境遇個案，論證華語語系文學並非單一地方所生成的文學，更是多地共構交織而成。¹ 多地共構的概念引領思考不同華語語系之間的跨文化接觸與協商，不再只糾結於中國與華語語系異地之間的辯證角力。該文以臺灣與馬華文學為例，嘗試討論中國之外的地方與地方之間彼此連結，相互生成。如此論述其實也回應了另一文「為何需要在臺灣談華語語系研究」的提問。² 該文是以臺灣原住民文學與馬華文學兩種華語語系文學在臺灣文化場域的相遇、認可與糾葛，思考臺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關係。兩文異曲同工，非但反思了論述位置，闡拓了論述空間，亦點出臺灣在華語語系的特殊位置。史書美回應此文認為「華語語系平臺為臺灣學界通往世界的窗口，面向國際，航向跨文化」，使「臺灣本土論述的深耕成果得以放在跨國脈絡」。³ 史書美接著在其〈放回世界的臺灣研究〉中指出要將臺灣文學的世界性讓世界看到、認可，所牽涉的不僅僅是文學作品自身或翻譯，也是學科建構、分類、方法論的問題。在比較文學視域下，以華語語系為研究框架的臺灣文學，便是使臺灣文學的世界性浮現於世界地圖上的一個方法。⁴ 然

¹ 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臺灣境遇為例〉，《臺灣文學學報》30期（2017），頁81-110。

² 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臺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卷1期（2015），頁25-62。

³ 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對臺灣文學的可能意義：為《中外文學》「華語與漢文專輯」所寫〉，《中外文學》44卷1期（2015），頁135-143。

⁴ 史書美，〈放回世界的臺灣研究〉，《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2018），頁120-138。

而，史書美雖表示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學子，從冷戰時期到現在持續有人到臺灣求學，對臺灣文學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她們一方面豐富了華語語系東南亞文學，也豐富了臺灣文學。⁵ 但史書美的論述強調多元化社群與人際網路的建構，在援引案例的時候卻偏重馬華，鮮少有其他國家地域的案例，除了有同質性過高的疑慮，或以單一或少數國家地域的情境，遮蔽甚或取代其他國家地域的實際具體情境的可能。換句話說，若將論述焦點置放在臺灣，如此的論述也會遮蔽臺灣與其他華語語系世界的實質交流歷史。實際上，臺灣與其他國家的華文社群交流，遠早於「華語語系」一詞的學術使用。但這並不妨礙以此後起的學術概念思考過去的實質歷史，甚或可藉此展闡論域。整體而言，在目前華語語系的相關研究中，馬華文學、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因為華語語系研究，獲得相當討論，⁶ 若加入菲華文學研究，對既有華語語系的討論顯然就有了新的樣本進入論域，不論是就道義倫理上的研究資源分配，或對於異質華文文藝美學、歷史、經驗的可能發掘都有積極的意義與價值。固然馬華文學值得論述，但是馬來西亞不等於東南亞，東南亞不只有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經驗風土也無法替代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經驗與風土。是以華語語系的研究若加入菲華文學或其他非馬來西亞的東南亞各國華語語系的討論，不但擴大了東南亞華語語系的論域與素材，對臺灣而言，也能避免單一論域遮蔽視野的遺憾。就文學史料與文學交流史的爬梳，亦極具學術關拓開展的價值。

臺灣與各地華語語系社群的連結向來緊密，尤其是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以後積極從政治、經濟、教育等面向推動僑務政策，一方面鞏固中華民國政權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呼應美蘇對立的冷戰局勢，防堵共產主義的滲透。⁷ 早在華語語系一詞流行前，李瑞騰在1992年發表的〈東南亞華文文學

⁵ 事實上，東南亞的華文寫作者即便沒有來臺灣求學，也一樣可以豐富華語語系東南亞文學，同時豐富臺灣文學。本文討論的菲律賓「耕園」或《陽光小集》「菲華詩展」的寫作者絕大部分沒有在臺灣求學，但也在臺灣發表作品。

⁶ 2017年亦曾有「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在拉曼大學舉行。但整體而言，仍是以馬華與臺灣原住民的討論最多。

⁷ 李盈慧，〈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暨大學報》1卷1期（1997），頁165-94；范雅梅，〈去祖國：二次戰後國民黨僑務政策中的地緣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2期（2011），頁137-177；吳子文，〈僑生教育與中華民國：臺灣國族想像的轉變，1951-2008〉，《文化研究》10期（2010），頁108-

在臺灣〉就已經用當時時空慣用的語言，記述了當時觀照臺灣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種因緣與連結：

等到國府遷臺，臺灣成為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而建政後的中共卻明顯採取鎖國政策，以至於海外僑胞所心向的「祖國」遂轉移到臺灣。在這種情況之下，文學開始有所交流乃是一種必然。⁸

如斯「祖國」轉移至臺灣的說法，素樸直接並精準符合事實與當時的感覺結構，觀察極具見地。可謂是一開始讓「中華民國」所謂的「華僑」直接與「臺灣」產生連結與發生意義的詮釋。⁹ 1975年6月於臺北出版，由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其中第十一章〈海外華僑文藝與國際文藝交流〉共有三節，依序為〈菲律賓的華僑文藝〉、〈其他地區的華僑文藝〉、〈國際文藝交流〉。相較於其他所有國家地區，一起被編入第二節；菲律賓則獨立為第一節，而〈菲律賓的華僑文藝〉由頁873至888，橫跨15頁，而其他地區包括香港與美國、馬來西亞等總共才6頁的篇幅。足可推知當時的官方立場是如何看重菲華。菲華對當時臺灣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¹⁰ 若以華語語系文藝的論述思考，菲律賓華語語系文藝與臺灣的關係顯然十分密切。可惜目前菲律賓華語語系的研究十分稀缺，討論其與臺灣關聯為核心路徑的研究更是少見。¹¹ 在1975年《中華民國文藝史》出版，臺（中華民國）

138。

⁸ 李瑞騰，〈東南亞華文文學在臺灣〉，《文訊》79期（1992），頁36-40。

⁹ 換言之，依此詮釋對應到本文，臺菲文藝交流有一從「民國」到「臺灣」的脈絡。謝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提點。

¹⁰ 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頁873-918。

¹¹ 目前國內菲華文藝的研究論述較少，李瑞騰教授是目前最早也處理最多的，單篇論述可見李瑞騰，〈菲華新詩的一些考察〉，《香港文學》80期（1991），頁34-40；李瑞騰，〈菲華現代詩中的華人處境〉，楊松年、王鼎康主編，《東南亞華人文學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出版社，1995），頁1-10；李瑞騰，〈我在菲華文學領域的探索〉，《中央月刊文訊別冊》2卷142期（1997），頁8-9。另外，李瑞騰，〈菲華散文的文化屬性——以選集為考察對象〉，《文訊》284期（2009），頁56-61。另外，洪淑苓，〈菲華現代詩中的「華」文化與在地經驗——以雲鶴、和權、謝馨詩作為例〉，《中國現代文學》35期（2019），頁89-112。該文討論了菲華現代詩的前行研究，包括中國的學者如劉登翰、古遠清、錢虹等人的

菲斷交之後，臺灣文學與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發展都面臨對複雜的典範變遷挑戰，無論是鄉土文學論戰或菲律賓在結束軍統後的菲華文藝復興，都特別值得討論與關注；然而，臺灣與菲律賓在文學上又有如何的交流？就史實觀之，李瑞騰在八〇年代中葉還特別在《文訊》專題企畫了「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足見當時臺灣與菲律賓的實質交流仍十分熱絡，在當今學界關於臺灣文學交流的論述卻鮮見其蹤，有待進一步掘發。

為集中論述焦點，本文擬以成立於1979年底、號稱臺灣現代詩的街頭運動的「陽光小集」與菲律賓華語語系的交會為討論核心，思索《陽光小集》中「菲華詩展」的意義與價值。理由有二：（一），「陽光小集」是目前所知首度與國外文藝社團：菲律賓「耕園」文藝社正式締結為姊妹社的文藝團體；（二），總共發行十三期的《陽光小集》竟有高達六期的「菲華詩展」，規模密度都絕無僅有。足可視為臺灣與菲律賓華語語系交流的一關鍵案例。

二、菲律賓耕園文藝社與臺灣陽光小集結盟

菲華文藝圈與臺灣早有來往，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菲律賓在獨立後追隨美國，堅決反共，¹² 與播遷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外交關係。當地華人也就如李瑞騰所論，在中華民國政府所在的臺灣重建了一個文化上的認同。¹³ 菲華詩人和權在1986年的《文訊》24期《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中撰有一文〈菲華詩壇近況〉指出：

論著，並以細緻的資料整理指出以往論述對於鄉愁／母土／故土情懷其實只是菲華現代詩作中的一部分，故將焦點轉移至「在地經驗」與「華」、「中國性」的辯證，值得參看。不過，該文研究重點在於詩人對於「華」文化的描繪與「中國性」的省思，與此處所指涉的菲律賓華語語系與臺灣的關聯方向與問題意識不同。若以臺灣與菲華的關聯，2015年趙萌鈺《戰後在臺菲華小說》可以參考，但此論文處理的是小說，時段則鎖定在菲律賓獨立之後，並且在菲律賓戒嚴（以及菲國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之前，與本文不同。

¹² 邢光祖，〈追憶在菲二十年的文藝活動（上）〉，《文訊》24期（1986），頁130。文中詳載1949年8月16日全菲僑胞組成60人「菲律賓華僑臺灣考察團」包機來臺，開海外僑胞宣示擁護政府效忠領袖的先河。

¹³ 李瑞騰，〈菲華散文的文化屬性——以選集為考察對象〉，頁58。亦可參考趙萌鈺，《戰後在臺菲華小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頁106。

菲華現代詩的突起，該歸功於六十年代初期，多位年輕詩人努力吸收西方的藝術精神，費心介紹現代詩的表現技巧，以及頻頻與國內詩人接觸、交流作品。同時該歸功於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主持「文藝講習班」，先後邀請臺灣名詩人余光中（一九六一年）、覃子豪（一九六二年）、紀弦（一九六三年）、蓉子（一九六五年）等人相繼來菲講學，造成現代詩的盛行。

早年，文藝團體戮力拓展詩運的計有「自由詩社」、「辛墾文藝社」、「耕園文藝社」、「青苗文藝社」、「飛雲社」。菲華詩人除了在他們分別所屬的文藝團體向「新聞日報」、「華僑日報」、「公理報」、「大中華日報」四大華文報借版出刊的園地上大量發表作品以外，也常在臺灣的「藍星」（覃子豪主編）、「詩、散文、木刻」（朱嘯秋主編）、「葡萄園」（文曉村主編）等詩刊上登載現代詩創作……現代詩的盛況延續到六十年代末期。一九七二年，菲國政府頒佈戒嚴令，菲華四家設有文藝副刊的中文報悉數停刊，詩人失去了根植的泥土，大多封筆。一九八一年，菲華文藝復興，一時活躍於早期詩壇的重要詩人和新世代詩人，紛紛在各文藝團體開放的園地上，及「世界日報」、「聯合日報」、「菲華時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創作，至此，現代詩風潮再度激盪開來。¹⁴（黑體字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和權此文相當簡要地勾勒了菲華現代詩壇與臺灣在菲華文藝復興前的交流關係。

文中提及的「文藝講習班」，對菲華現代詩影響深刻，菲華第一個純粹現代詩的文藝團體「自由詩社」的創設就與此有直接關係。香港詩人王偉明曾訪談創組「自由詩社」的雲鶴，除了問起「自由詩社」的創社宗旨與成員，也提及雲鶴曾參加青年文藝講習班，深受當時臺灣流行的現代主義文學薰陶。雲鶴表示：

六十年代創組「自由詩社」，主要是來自臺灣現代詩運動的衝擊。其

¹⁴ 和權，〈菲華詩壇近況〉，《文訊月刊》24期（1986），頁195-196。

時，菲華報刊上新詩創作表現方式均較為傳統，但在「自由詩社」創社後，我在先父《新潮》副刊中大量引進現代詩理論與臺灣現代詩人的作品，也大量發表「自由詩社」同仁的詩作，令菲華新詩愛好者，視野頓時開闊。¹⁵

他也在訪談中除了說明「自由詩社」出版了菲華第一本現代詩選集《一九六一》，詩社主要成員是小夜曲（莊垂明）、月曲了（蔡景龍）、南山鶴（陳戰雄）、嵩山鶴（施能昭）、藍菱（陳婉芬）、吳天霽。也自述臺灣詩人痲弦、洛夫、葉珊、商禽、白浪萍在不同方面影響其創作。他亦表示菲律賓本土的華文詩人，對他並未產生可以一提的影響。他更直言，菲華文藝在極長的時期是以臺灣文藝馬首是瞻；最淺顯的例子就是六十年代菲華的現代詩運動，算是菲華文學史中一個劃時代的事件。¹⁶如是觀之，可知菲華現代詩接受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澆灌甚深。

「耕園」與「陽光小集」結盟後，1982年6月25日出版刊出的《陽光小集》9期（1982春·夏季號），就刊出林驩〈簡介菲華耕園文藝社——從創立經過至未來展望〉一文。文中指出菲律賓「耕園文藝社」成立於1959年，一開始成員有王國棟（王若）、莊榮遠（冬雲）、莊彬松（寒松）、陳奉輝（陳默）、許露麟（庚竹）、陳鴻山（夏牧）等親自執筆，先後開闢三個純文藝創作園地。先在《大中華日報》開闢《耕園》雙周刊，投稿踴躍，續在《新閩日報》上創刊《芳草集》新詩雙周刊，又在《公理報》上另立《拓荒》雙周刊。1972年9月因菲律賓政府實行戒嚴令，「耕園」只好停刊。不過，王國棟於1979年菲律賓尚未解嚴前就曾帶領「耕園文藝社」至臺灣訪問，1981年菲律賓軍統令解除，「耕園」是菲華復刊的第一個文藝社。1982年5月19日「耕園」與臺灣「陽光小集」詩社結為姊妹社。¹⁷從「耕園文藝社」社長王國棟（1931-1985）的文章〈為文藝請命——耕園文藝社復刊一週年紀念〉可以窺見一二：

¹⁵ 王偉明，〈敲響簾外季節的憂鬱——訪雲鶴〉，雲鶴，《沒有貓的長巷》（臺北：秀威，2010），頁266-267。

¹⁶ 王偉明，〈敲響簾外季節的憂鬱——訪雲鶴〉，頁265-275。

¹⁷ 可參考林驩，〈簡介菲華耕園文藝社——從創立經過至未來展望〉，《陽光小集》9期（1982），頁142-144。

一年來我們感到最安慰的是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我們正式與國內「陽光小集」結盟，這雖然不敢說是絕後，卻可以說是空前。¹⁸

王國棟此文原初刊出在菲律賓華文報紙《聯合日報》的「耕園」，這裡用「國內」稱臺灣，實際上以菲律賓公民的角度是「國外」。固然是因為當時在菲律賓閱讀此報的讀者，絕大多數是菲律賓華人，並與臺灣親善，取其親切之意，但也可見當時菲華文藝圈與臺灣關係之密切。根據《陽光小集》「一九八二年詩壇記事」中5月19日所載：

菲律賓耕園文藝社社長王國棟、社員林騮、許露麟來臺，與陽光小集詩社向陽、張雪映、林野雙方代表在臺北正式簽署合同，成立姊妹社，共同推展詩運，相互交流作品，這是國內文藝社團首度與海外締結的聯盟。¹⁹

若如張雪映所述「這是國內文藝社團首度與海外締結的聯盟」，相應於張雪映文中以臺灣角度指稱的「首度」，王國棟文中特別指出這樣的跨國結盟對於菲華社群而言，亦屬「空前」。可見兩國的文藝團體都有人注意到此事件在彼此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不過，或許是身在其中的時空限制，即便是《陽光小集》中與菲律賓「耕園文藝社」正式簽約的成員本身在思考該事件時，也未將其放入現代詩壇十大事件或藉此思考文學史上的意義。向陽曾經在《陽光小集》11期（1983年夏季號）發表〈熱鬧非常，意義重大——一九八二年現代詩壇十大事件〉選出他眼中1982年臺灣現代詩壇的十大事件，並以事件重要性依序加以報導：（一）「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於臺北召開；（二）洛夫「詩壇春秋三十年」事件；（三）陽光小集策畫「十大詩人選舉」；（四）三十年來第一家詩刊遭查禁；（五）歷史性詩刊復刊；（六）中國時報主辦「新詩座談會」；（七）兒童詩獲得國家文藝獎；（八）詩選集銷路大增；（九）詩壇新秀輩出；（十）詩壇出現幽默漫畫。據該文所言，此十大事件的選擇來源是張雪映整理的「一九八二年詩壇記

¹⁸ 王國棟，〈為文藝請命——耕園文藝社復刊一週年紀念〉，《芥蒂集》（馬尼拉：王國棟文藝基金會，2018），頁61。

¹⁹ 張雪映，〈一九八二年詩壇記事〉，《陽光小集》11期（1983）。

事」，揀選的標準則如其所言，考究的是「該一事件的影響力、意義性，及其未來的發展性。以此三者作為天平，故凡為例行活動（如創刊幾週年之活動、詩與民歌演唱）獲獎、茶會、異動、社交等均不在選擇之列，如此汰取，『十大事件』自然產生。」²⁰更客氣表示「當然其中仍難免有主觀判斷，是耶非耶，則有待公評了。」平心而論，向陽選出的這1982年現代詩壇十大事件，即便以今日角度思考回望，仍舊意義重大。不過，若以「影響力、意義性，及其未來的發展性」來思考，此十大事件實有遺珠之憾。鏡考其列為十大之首的「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於臺北召開，評選人應當是考量臺灣群島上的中華民國國內六大詩社合作，圓滿成功辦成大會，更提出「亞洲現代詩人聯盟」（雖功敗垂成），但已為亞洲現代詩人的交流奠下了基礎。此事件若視為世界中（尤其是亞洲）的臺灣文學事件，也十分貼切。可見向陽在思考十大事件時，已把跨國交流納入「影響力、意義性，及其未來發展性」的考量，也就是已經對臺灣文學在世界中的位置有所思考。可惜的是，相較於如此大規模的國際交流，1982年的臺灣詩壇的「陽光小集」與菲律賓「耕園」締結盟約這一國際文藝事件，與向陽所列頭條互相呼應，相較於以臺灣為基座由南向北的三國，這是以臺灣為基準南向的兩國，規模雖較小，但就影響力、意義性及當時持續的發展性而言，實際上毫不遜色，甚至意義更深刻。

楊宗翰曾在其〈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質析論〉中指出「陽光小集」將外部連結延伸至菲律賓。該刊第9期聲明：「有鑑於德華出版社承印本刊，再三延宕，曠時日久，深感愧負讀者們長久熱烈支持愛護，乃毅然與該社提前解約，即自春季號（第9期）起，自力印刷發行」、「為昭信於讀者，保證從此按時出刊，建立確鑿之信譽，乃以同仁認股之方式，並與菲律賓耕園文藝社協同籌資，勉力另行創辦『陽光小集出版公司』」。該文註釋9更指出該期「登音」欄即載明：「巴士海峽兩岸的詩人握緊了雙手。」、「『陽光小集』與菲律賓『耕園文藝社』結為姊妹社」，並刊有一輯「菲華詩展」。²¹或許是書寫目的與篇幅的限制，楊宗翰並未多著筆墨指

²⁰ 向陽，〈熱鬧非常，意義重大——一九八二年現代詩壇十大事件〉，《陽光小集》11期（1983）。

²¹ 楊宗翰，〈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質析論〉，楊宗翰主編，《交會的風雷：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集》（臺北：允晨，2018），頁273-274。

出此事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但其特意拈出「陽光小集」將連結延伸至菲律賓，顯然已敏銳覺知此事之特殊。成立於1979年的「陽光小集」，堪稱是一九七〇年代新興詩社中鋒頭最健的一個，所謂「不純的詩社」²²，將詩的多元連結與推展做了許多極具開拓意義的嘗試。²³

前文提及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所述的臺菲交流未及於1975年之後，而1975年6月9日正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與菲律賓共和國斷交的時刻；也是菲律賓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與菲律賓在冷戰中屬於同一陣線，兩國由正式邦交至斷交，這使得兩國之間的華人交流，有了更多可思考探究的面向。若將時空的背景放大，兩國同屬於冷戰結構同一陣線，卻在1975年從正式邦交國的狀態斷交。菲律賓華人更經歷了1972年至1981年間的軍統戒嚴與全面菲化後，顯然是在多重危脆情境中，迎來了菲華文藝復興且仍舊與臺灣文藝圈保持緊密連結，可謂是非華社會正處於轉型中；同一個時段的臺灣在1970年代一連串外交局勢變化，讓臺灣作家陷入身分與認同危機，也召喚起不同面向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從釣魚臺事件開始、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自此正式喪失代表「中國」的國際身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並簽署「上海公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同年，日本宣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臺灣（中華民國）斷交，以及其後包括菲律賓的各邦交國斷交潮，更有鄉土文學論戰、臺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等等大事發生，更不用提這時的臺灣也都處於戒嚴狀態，臺灣社會也面臨多重危脆的情境，但也一樣處於轉型中，形成所謂「回歸現實」世代。²⁴ 兩國的華語語系文藝團體卻在此時進一步連結，逾越種種限制。

此外，此結盟發生於1975年菲律賓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當時最先在菲律賓解嚴後復刊的菲華文藝團體仍舊以臺灣為最重視的交流場域。如此，實可將臺菲的文藝交流拉出一條「民國至臺灣」的時間軸。從臺灣文學的位置出發，這是一種文藝交流的「新

²² 向陽，〈在陽光下挺進——詩壇需要「不純」的詩雜誌〉，《陽光小集》10期（1982）。

²³ 《陽光小集》詩雜誌第9期，也就是1982春·夏季號，出刊於1982年6月25日。

²⁴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南向」。當然臺灣與菲律賓的華文文藝交流遠早於此，我們也不得不思考，早年在藍星諸君（覃子豪、余光中等）的影響下，菲華有「自由詩社」的成立，那樣的互動交流和「陽光小集」與「耕園」又有何不同？

首先，菲華「自由詩社」的成立晚於藍星詩社，自由詩社的成員多視藍星諸君為師長前輩；但菲華「耕園」成立於1959年的歷史遠較成立於1979年的「陽光小集」悠遠，「耕園」成員的年紀如王國棟先生等人普遍年長於臺灣的「陽光小集」成員。此外，以詩為核心的「自由詩社」也沒有與以詩為核心的「藍星詩社」締結為姊妹社。涵納各種文類甚至美編的「耕園」文藝社與不純的詩社「陽光小集」則正式以現代文藝團體平等結盟的方式來往，對兩國而言都是第一遭。²⁵更重要的是，如果跨國文藝社團正式締結姊妹社，卻未有實際作品交流、共同推展詩運的話，其實質意義也就僅止於象徵，其影響與發展相對有限。不過，對於菲律賓的「耕園」與臺灣的「陽光小集」而言則絕非僅是形式上的締結姊妹社或聯誼，而是有實質的出版交流。楊宗翰就已指出「『陽光小集』與菲律賓『耕園文藝社』結為姊妹社」，並刊有一輯「菲華詩展」。²⁶實際上，「菲華詩展」在《陽光小集》詩雜誌的刊出並非曇花一現。李瑞騰〈東南亞華文文學在臺灣〉一文已指出八〇年代《陽光小集》詩雜誌曾連續三期（10-12）刊出「菲華詩展」。²⁷兩位學者都極有見識地關注到此現象，指出「陽光小集」與「耕園」的結盟，可惜沒有進一步加以論述。將兩者提及的期數相加，《陽光小集》詩雜誌共有四期刊出「菲華詩展」，由第9期至第12期。若以先前蒐集到的紀錄，「耕園文藝社」與「陽光小集」詩社於1982年結為姊妹社，正好吻合該刊9期的聲明。

然而，筆者發現《陽光小集》8期（1982年2月20日）就已有「菲華詩展」的刊出；而且該期封底已有「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陽光小集》第13期1984「政治詩專輯」，也就是解散前的最後一輯，依舊有「菲華詩展」。換言之，「菲華詩展」在陽光小集詩刊的刊出共有六期，從第8期至

²⁵ 謝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提問，故於此把成立於1954年的臺灣「藍星」與受其影響成立於1959年的菲律賓「自由詩社」的互動交流與成立於1959年的菲律賓「耕園文藝社」和成立於1979年的「陽光小集」互動交流比較，讓此題討論的價值更為立體。

²⁶ 楊宗翰，〈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質析論〉，頁273-274。

²⁷ 李瑞騰，〈東南亞華文文學在臺灣〉，頁37。

最後一期第13期末曾間斷。總共發行十三期詩刊的《陽光小集》竟有連續六期「菲華詩展」，比例將近一半，如此高比例高密度高規格的跨國合作，在臺灣目前所見的解嚴前現代詩刊都屬罕見，甚至可謂絕無僅有。對於「耕園文藝社」與「陽光小集」締結為姊妹社在臺灣與菲律賓現代文學史上的「首度」、「空前」跨國結盟，其實「菲華詩展」的刊出更是兩社結盟的具體實踐，堪稱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藍星詩社」成員雖與菲華「自由詩社」交往密切，但「藍星詩社」除了沒有與「自由詩社」平等結盟，詩刊也未曾如與菲華「耕園」締結姊妹社的《陽光小集》設有如此規模的「菲華詩展」。²⁸

以今日華語語系的角度觀之，這對於「世界中」的臺灣文學也極具意義。姑不論，菲律賓與臺灣的種種因緣。菲華文學是華語語系文學的一支，也是菲律賓文學的一支，而且還是菲律賓文學中可以與菲語（塔加洛語，屬南島語系）、英語、西班牙語等語種一起評比該國描轆沓斯文學獎的文學。而菲律賓在世界中的位置，也是亞洲或東南亞唯一同時有西班牙、美國與日本殖民經驗而脈絡特殊且豐富多元，連結發展的脈絡腹地，不論是英語語系、西語語系或南島語系都幅員甚廣。臺灣文學中的華語語系文學與菲華文學關係密切，若以此為線索，似乎也是另一條與世界共振的發展機緣。若能將此深度經營，不但可關拓臺灣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視域，其實也是考掘臺灣文學本身既有卻被忽略的歷史，未來也能更多角度多層面地思索臺灣文學在世界中的輻射、影響、交流與關連。然而，這需要進一步地文本分析與討論，方能掘發其中的意義與價值。

三、臺灣《陽光小集》所刊出的 「菲華詩展」及其特色

1982年5月19日菲律賓耕園文藝社與臺灣「陽光小集」詩社結為姊妹社，雙方代表簽屬合同。但考索資料，可以發現在兩者締結姊妹社前，在1982年2月20日出版刊出的《陽光小集》第8期1981冬季號就已有「菲華詩展」刊出。而實際出版刊出於1982年2月20日，企劃組稿的時間自然要在初

²⁸ 臺灣的「創世紀詩社」於1986年9月的《創世紀詩雜誌》68期刊有「菲律賓華僑詩選」，時序上晚於《陽光小集》，也非如《陽光小集》連續刊出六期「菲華詩展」。不過，「創世紀」與菲華的關係也淵源久且深，筆者將另文討論。

刊之前，顯然兩邊關於作品的交流是更早就有共識了。如果更細心地查考《陽光小集》第8期1981冬季號就已經列有菲律賓聯絡處，並寫上當時「耕園」文藝社社長王國棟的姓名，顯然是以他為菲律賓聯絡人，地址也是王國棟在Malabon的居所。考索《陽光小集》第8期的〈陽光走廊〉，可以發現此事。1981年12月，王國棟、許露麟、亞薇等人來臺北參加亞洲華文作家會談，並於19日拜訪「陽光小集」，會晤了向陽、張雪映、陳寧貴等「陽光小集」同仁，討論寫作並結交友誼。菲律賓「耕園文藝社」社長王國棟（王若）建議兩社結為姊妹社，彼此交流發表作品，共同為文藝而努力。

有意思的是，考索《陽光小集》第8期刊出「菲華詩展」的作者，並沒有特別突出「耕園」在其中的位置。但是本期的一般詩作中，收錄了王若（王國棟）的〈生命的轉站〉與許露麟的〈馴虎者〉。放置「菲華詩展」前的〈前言〉則由菲律賓的莊垂明所作，特別提到「耕園」與「辛墾」在菲律賓解嚴後重出江湖。不過，這期的「菲華詩展」詩作組稿，反而更凸顯「自由詩社」的脈絡。不論是前言的作者莊垂明，曾任菲律賓自由詩社社長並自述在詩展中收錄的詩人艾鴻也是自由詩社的健將。兩人與王若交好，但其並非「耕園」同仁。不過，由此或許也可推知，當時菲華文藝圈想與臺灣的「陽光小集」結盟或交流，可能不限於「耕園」。王勇〈再現「陽光」〉就曾如是表示：

在我參與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菲華詩壇，追捧的臺灣現代詩讀物是《創世紀》詩刊與《陽光小集》詩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成立的「陽光小集」，是詩社，也作為詩刊名。當年《陽光小集》詩刊在菲華詩友間是需要爭相借閱的，向陽、張雪映、苦苓、林野、陳煌、陳寧貴、劉克襄等詩人的詩我一讀再讀，還有林文義的漫畫和他稚拙的硬筆字，我都很喜歡。《陽光小集》有許多創舉，如封面選用毛筆手書名詩，白荻的《廣場》就引起過菲華詩友的廣泛討論、賞析，記得還發起過以《廣場》為題的同題詩創作。該刊舉辦的「當代十大詩人」選舉與「詩與民歌」之夜專題，都曾讓我們讀得大呼過癮。只是「十大」嚴格意義上應該是「臺灣十大」。²⁹

²⁹ 王勇，〈再現「陽光」〉，http://ningkuei.blogspot.com/2015/11/blog-post_7.html（2024.04.25徵引）。

由王勇的描述，就可知道《陽光小集》深刻地吸引了菲華詩壇，所以「當年《陽光小集》詩刊在菲華詩友間是需要爭相借閱的」。而相對於王勇等人追捧的另一本詩刊《創世紀》，《陽光小集》比較不純，但有更多創舉。除了詩作，他特別提到林文義的漫畫與硬筆字、「該刊舉辦的『當代十大詩人』選舉與『詩與民歌』之夜專題，都曾讓我們讀得大呼過癮。」〈廣場〉一詩引起廣泛討論，甚至還以〈廣場〉為題同題競作。如此歷歷在目，顯然所言不虛。可見這被稱為「現代詩的街頭運動」，的確充滿活力與衝撞力，衝過國界，撼動了菲華文藝圈。或許也可部分解釋為何菲華文藝復興的領頭羊「耕園」，成立於1959年但沒有選擇臺灣的老牌詩社如「創世紀」、「藍星」或「笠」，而選擇1979年成立的「陽光小集」結盟。

「菲華詩展」既然在臺灣的刊物《陽光小集》刊出，標舉「菲華」，自然是以華語文創作為考量。但《陽光小集》甚至當時大部分臺灣的刊物刊出的詩作自然也以華語文作品佔絕大多數；若要在這些作品中被識別，顯然需要有進一步對於自身創作位置的思量。換言之，同樣是華文創作，臺灣與菲律賓之別，自然是臺菲兩地地域的不同。尤其前面提及的和權、雲鶴、王勇等菲華創作者都約略陳述了不同時期臺灣現代詩對菲華現代詩的影響。是在進行臺灣文學刊物《陽光小集》所刊出的「菲華詩展」討論前，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當時「菲華文學」是否已有自己的內容與風格？若將時間定位在《陽光小集》停刊後，吳天霽在1985年「菲華文學的困境與突破」座談會上的發言，頗值得參考：

菲華的現代詩可以說完全受到臺灣的影響和引導，沒有臺灣的前行輩，也就沒有菲華的現代詩。因為那時我們和大陸沒有來往，只有和臺灣有往來。在草創時期，我們完全處於模仿的階段，臺灣出現了什麼風格的詩，我們這裡也跟著出現相同風格的詩，不論是臺灣的，或者是由菲律賓寄往臺灣發表的詩，根本分不出來有什麼差別。草創時期大約在一九五七年開始，到了一九六七年，現代詩就漸漸沒落，沒有人寫，到了軍統時期，就更不用說。

後來，在一九八〇年文藝復興後，現代詩在菲律賓忽然被承認，它的風格也和臺灣不一樣。雖然在這以前，我們向臺灣的前行輩學習了不

少東西，但是在內容上，我們開始有了自己的風格。我想菲華現代詩的前途是相當光明的，因為我們已經可以和臺灣以及大陸互做比較了，我提出這個看法，供李先生參考。³⁰

然而，在同一場座談會中，王禮溥對於菲華文學特殊風格是否已形成的回應是：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可以令人很驕傲的是菲華的新詩。我們的新詩這幾年來進步非常快，我們的新詩拿到臺灣去，也會令人覺得很高興，菲華有這種作品。至於菲華文學特殊風格是否已經形成，我覺得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形成。所謂風格的形成，以個人來說，表現技巧、學術、思想、意識都成熟了，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我記得林泥水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就提倡華僑文學，這就是一種風格。我還記得張放先生上次在耕園、辛墾、千島所主持的座談會上，提議走出華人區，這個就是形式內容的建立。我想，這一點我們還沒建立，也就是說我們菲華沒有自己特殊的風格，也許現在已經開始了。因為從一九八一年文藝復興以來，一九八一年副刊有了，文藝園地有了。第一個出刊的是「耕園」，然後是「竹苑」、「辛墾」這些版位。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也許可以覺得很樂觀，因為這幾年以來，只有四年的時間，但是華僑方面對文藝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注意，這就是值得我們樂觀的地方。³¹

雖然兩人對於1985年座談會時菲華文學是否已形成獨特風格的判定有所區別，吳天霽的說法較為樂觀而肯定，王禮溥則對於形成菲華特殊風格顯得樂觀而保守。但兩人不約而同提到菲華現代文學中的「詩」，都以臺灣為參照標的，這顯非偶然。吳天霽亦是菲華第一個純粹研究推動現代詩創作的團體「自由詩社」的成員，他直言菲華現代詩草創時期完全模習臺灣，對照前引王偉明與雲鶴與的訪談討論，可以知道菲華現代詩風潮，深受臺灣現代主義

³⁰ 吳天霽發言，楊錦郁紀錄，〈菲華文學的困境與突破〉，《文訊》24期（1986），頁75-76。

³¹ 王禮溥發言，楊錦郁紀錄，〈菲華文學的困境與突破〉，頁77-78。

文學的澆灌甚深。更值得思考的是，這場1985年舉辦的座談會，兩位菲華詩人已在自覺地討論菲華是否形成獨特風格，雖然判定不同，顯然有不同立場與理念，但討論風格表示場域中的美學位置分量增加，更顯示出菲華文藝在當時的相對成熟。不過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王禮溥提及張放的建議「走出華人區」。張放的建議甚有價值，的確會讓菲華文學更有獨特的在地性。但若換個角度想，在時間的流轉中，其實菲律賓的華人區，又何嘗沒有菲律賓自己的特色？這兩位作者在思考「菲華文學」是否有別於「臺灣文學」特色的發言同時，其實已間接證明了臺灣文學早已跨過巴士海峽深刻地影響了菲律賓的華文文學，放在國際的尺度思考，顯然早已跨過國界。不過，兩人的發言是在1985年，換言之，是在1984年6月《陽光小集》最後一期第13期「政治詩專輯」出刊後。就時間的斷點看來，特別有意思。兩位菲華詩人正是在《陽光小集》連續六期「菲華詩展」結束後隔年討論菲華文學（尤其是詩）是否形成獨特風格，《陽光小集》「菲華詩展」作為關鍵案例，就更具討論的代表意義與價值。

探蹟分析《陽光小集》中的「菲華詩展」，雖然無法完全代表所有的菲華文學，但可以知道在菲華文藝復興伊始，菲華文藝團體想在臺灣的刊物上呈現的作品，若僅就素樸地策展動機，交流也是想讓彼此觀摩，輸入也有輸出，自然期盼有所表現。前引1985年吳天霽所言「雖然在這（按：八〇年代）以前，我們向臺灣的前行輩學習了不少東西，但是在內容上，我們開始有了自己的風格。」是一種自豪；與吳天霽判讀有別的王禮溥，即便認為當時菲華文學的特殊風格還未形成，「也許現在已經開始了」，但也指出「我們的新詩這幾年來進步非常快，我們的新詩拿到臺灣去，也會令人覺得很高興，菲華有這種作品。」綜合兩人說法，亦可見在菲華文藝復興時期，菲華文學在當時是以臺灣為目標場域，襲仿與比較的典範也是以當時的臺灣作品為尚，並指出1981菲華文藝復興以來的四年，愈來愈樂觀。而本文所探究的《陽光小集》「菲華詩展」就是在菲華文藝復興之後才有的，也是目前所知臺灣詩刊最早且規模最大的「菲華詩展」。³² 探究此事，實有指標意義。

³² 1986年《創世紀詩雜誌》68期有「菲律賓華僑詩選」，收錄和權、陳默、月曲了、莊垂明、謝馨、林泥水、林泉、吳天霽、文志、雲鶴、蘇劍虹十一位菲華詩人的作品共十五首。但這是《陽光小集》連續六期「菲華詩展」之後才策劃刊出的一期。但此時已是《陽光小集》停刊「菲華詩展」結束後一年，當時「創世紀」也未與菲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這兩位人士對於自身定位的思考也許也可參考。王禮溥以「華僑」自稱，並就自己的觀察表示，形式內容仍舊還未走出華人區。但若對照吳天霽1986年刊載於《創世紀詩雜誌》「菲律賓華僑詩選」的作品〈家在千島上〉，卻可以看到另一種光景：

我們的家／散落在千島上／朋友、親人／划舟相探望／起火、圍坐
／在沙灘上／飲椰子酒／用最親密的母語／講盤古開天／女媧補天／
講，羿射九日／夸父追日／與晚潮同贊嘆／多美麗的神話啊／神話多
美麗／已經是遙遠的年代了／只在夢裡／與我們相依／及至明天／晨
曦爬入窗內／摸醒我們／我們看到的／仍是一大片海／漂浮的島嶼／
我們想到的／仍是曝曬的漁網／修補舟楫³³

這首詩很自然地把漢語的各種神話與島嶼的自然環境與生活融合，來自宿霧的吳天霽，顯然在這首詩中已經找到了「千島」獨特的元素與力量，與千島這塊土地共同呼吸，所以不再以「華僑社會」慣於想像的故國情懷、懷舊懷鄉為主題，開始紮根菲律賓群島。當然，他也毫不否認或排斥自己的華人華裔身分，而華人傳統的傳說他也能欣賞，但也更自覺地落實在地化。這與謝馨的詩作一樣，可謂是在八〇年代菲華仍多以故國情懷想像為主流主題詩作中獨樹一幟。那麼在此之前的《陽光小集》「菲華詩展」是否已有突破「華僑社會」慣於想像的故國情懷、懷舊懷鄉為主題，更回歸現實，根植菲律賓在地的詩作呢？當然，若吳天霽有此反省、觀察與實踐，菲華部分作者開始轉向尋求別於臺灣流行的內容與風格，轉向追求所居土地是否也與臺灣文學的發展走向與思潮有關？換言之，菲華文藝復興後積極追求特色與在地思考，是否正與當時臺灣「回歸現實」的思潮有所關涉？當然，這樣的假設，是指開始有這樣的趨向，而非全面性的。然不論如何，仍舊需進行《陽光小集》「菲華詩展」這些具體文本的分析。

律賓文藝社團締結盟約。不論時序與規模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都不及《陽光小集》「菲華詩展」。其中內容與脈絡亦雖然多有可論，限於篇幅，筆者將另文深論。

³³ 「菲律賓華僑詩選」原收錄於吳天霽，〈家在千島上〉，《創世紀詩雜誌》68期（1986），頁92。後收入於吳天霽，〈20世紀八十年代作品〉，《跨世紀詩選》（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2008）。

先不論語言技巧，分析這些文本的，主題內容顯然最易直接辨識差異。就詩作主題與內容觀之，林泉的〈PANGKAT KAWAYAN〉是《陽光小集》8期1981冬季號「菲華詩展」中最具辨識度者，內容為：

自光滑竹管中／把肺裡滿腔的星星／吹向無涯空間／手中敲出的是整
座竹林秋韻／一葉一聲都訴盡了／無限衷情／以無數竹製的音符／排
成無數個長長階梯／直搭向我們眾多耳朵

【註】PANGKAT KAWAYAN，菲人的樂器，全部以竹製成。³⁴

此詩是一首詠物詩，敘述中有浪漫新鮮的想像，例如「把肺裡滿腔的星星／吹向無涯空間」。詠物的主題與當時主流的臺灣詩作大相逕庭，也令不熟悉菲律賓文化的一般讀者感到陌生／新奇。詩名以菲語（塔加洛語）用羅馬拼音書寫，極易讓慣於閱讀漢字的讀者注意到其特異，內容主題是菲律賓原住民全部以竹製成的樂器，可謂獨樹一幟，令人印象深刻。此詩雖以華語漢字進行創作，內容卻毫無故國情懷等色彩，反而藉助菲律賓原住民的文化進行創作，想像清新。該期其他「菲華詩展」的作品在內容與主題上則較無法辨識出菲律賓獨有的特色。

「耕園」與「陽光小集」結盟後，「菲華詩展」刊出的作品內容較能辨識「菲律賓」1982年6月25日出版刊出的《陽光小集》9期（1982春·夏季號），詩作就主題而言，具體寫到菲律賓的有月曲了〈海外的窗前〉：

馬尼拉的泥街上／徒有漢人的足跡／但無訪者／唯這海風／故意推開
我的大門／在海外的窗前／要獨坐幾代呢／你們的汗在我的額上／我
已記不起你們的冬天／寫不出自己的雪景／千年之後／唐朝該是假的
／中原飄來的酒香才是真的／可惜馬車無輪／行人無步³⁵

詩中特別提及「馬尼拉的泥街上」，顯然作者已注意到「菲華詩展」中「菲律賓」特色的呈顯，因為這是專屬於菲律賓的場景。月曲了詩中舉重若輕地

³⁴ 林泉，〈PANGKAT KAWAYAN〉，《陽光小集》8期（1981），頁68。

³⁵ 月曲了，〈海外的窗前〉，《陽光小集》9期（1982），頁149。

把古典的想像與當代的現實雜揉，時空交錯下他自問「在海外的窗前/要獨坐幾代呢」更慨歎「記不起你們的冬天／寫不出自己的雪景」。菲律賓氣候炎熱，冬天依舊溫暖，如何能有雪？顯然這是喜好古典漢文學的月曲了意有所指的想像。「漢人」、「唐朝」、「中原」這些詞彙，是出生在菲律賓的月曲了特別在意的詞彙，相對於在菲律賓的其他族群，華人的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二，月曲了或許因此感到惆悵，沒有歸屬感，是以強烈地懷念「海內」，以及「漢人」、「唐朝」、「中原」這些符號，所以把自己定位在「海外的窗前」。不可否認，菲華詩作中有不少這類詩作，這也是許多人對於菲華文學總是「故國情懷」、「懷鄉思鄉」的印象。李瑞騰就曾敏銳指出戰後的菲華散文「比較少對應當下現實，作家們雖也寫人記事、描景詠物，但他們所懷之鄉、所憶之昔，常是過去的中國，帶著憤怒，或者哀傷，作者以抒情之筆在家園／異鄉，過去／現在之間擺盪徘徊。」³⁶ 這種現象其實不限於菲華散文，詩作亦常見。但是，即便詩人始終沒有對應當下現實，把自己當成菲律賓的異鄉人，呈現強烈的「懷鄉」情結。但是菲律賓還是在他的作品中浮現，依舊呈現出別於臺灣的特色，海外的窗前是在菲律賓的窗前，馬尼拉的泥街上也是在菲律賓。當然，我們就可以發現雖然是寫菲律賓，有些詩作中的菲律賓是詩人不得已的背景，心之所向仍是想像中的漢、唐、中原等「中國」符碼；也有如林泉〈PANGKAT KAWAYAN〉一樣的詩，以菲律賓為主體的創作。同樣是9期，吳天霽〈射殺夕陽〉一詩也頗值得一提，此詩雖沒有標舉菲律賓，但內容書寫菲律賓的歷史：

一九四三年以後／他只記得／一把武士刀／與他父親的／密切／關係
／以後／他的眼睛反覆敘述一個故事／一到了黃昏／便舉起手當作機
關槍／向夕陽射殺過去³⁷

此詩有兩個解讀的關鍵詞，分別是1943年與武士刀。若回應歷史時空，菲律賓在西元1941到1945年之間，短暫被日本佔領，1941年12月日本人在轟炸夏威夷後即入侵菲律賓，1942年菲律賓徹底淪陷，發生了令菲律賓人餘悸猶

³⁶ 李瑞騰，〈菲華散文的文化屬性——以選集為考察對象〉，頁57。

³⁷ 吳天霽，〈射殺夕陽〉，《陽光小集》9期（1982），頁152。

存，戰俘被迫徒步約一百公里，死傷眾多的巴丹半島死亡行軍；1943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訪問菲律賓，同意給予菲律賓獨立，作為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同年十月菲律賓第二共和國成立，並簽署《菲日同盟條約》。³⁸ 對菲律賓人而言，1943年與日本的關係是極為複雜且痛苦的記憶。若不熟悉菲律賓歷史，閱讀吳天霽這首詩其實無法馬上理出脈絡；但若知道菲律賓歷史，脈絡就清楚可辨，也可以把「夕陽」與「日本」的國旗相對應，可以推知吳天霽是以菲律賓人的角度思考創作此詩。

1982年10月31日出版刊出的《陽光小集》10期（1982秋季號），謝馨的〈王彬街〉直接討論菲律賓的唐人街「王彬街」，莊垂明的〈蒼龍〉則提到馬尼拉唐人街的拱門，月曲了的〈心事〉則是提到在菲律賓過夜與種族之別。謝馨與莊垂明的詩作其實都在寫馬尼拉的唐人街。乍看之下，頗有投射思鄉懷鄉的情懷。不過，所書寫並想像的情景與情境是根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實際地景，而且兩人的寫法也頗不相同。謝馨詩作的高妙在於最後體認現實的反思「王彬街不在中國／王彬街不是中國」³⁹，明確表明王彬街是在菲律賓，超拔跳脫當時菲華文藝鄉愁書寫的窠臼。莊垂明的〈蒼龍〉：

一條蒼龍／盤踞在「中菲親善門」的／簷角上／既不騰空／亦不伏地
／標本似的擱在那兒／任由時間／赫赫刮下／牠片片的鱗甲⁴⁰

「龍」常是華人愛用祥獸意象，詩中的「中菲親善門」正好與「中菲友誼門」分別座立在王彬街的兩端。有意思的是，菲華與播遷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向來親近；而冷戰時期，如前引李瑞騰所論，遷至臺灣的中華民國自然轉化成許多華僑的祖國，一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鎖國，另一方面當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每每強調其自由「中國」的形象，主張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1971年中

³⁸ 可參考陳鴻瑜，〈第十章 日本佔領與第二共和時期〉，《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臺北：三民，2018），頁97-101；菲利浦·鮑靈（Philip Bowring）著，馮奕達譯，〈第四章 擇惡〉，《現代菲律賓的誕生》（臺北：時報，2024），頁89-100。

³⁹ 謝馨，〈王彬街〉，《陽光小集》10期（1982），頁106-107。

⁴⁰ 莊垂明，〈蒼龍〉，《陽光小集》10期（1982），頁108。

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中國席位，1975年菲律賓政府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甚至1978年底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公報，表示於1979年元旦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除了震撼臺灣，對於向來與臺灣親近的菲華文藝圈自然也十分震撼。對應當時的國際情勢，莊垂明此詩中的「龍」如標本，動彈不得，任時間赫赫刮下片片鱗甲，有一種無奈莫名的酸楚。同期收入的月曲了〈心事〉內容如下：

猜拳的手／已不見／誰來牽／我們的孩子／姑且吹簫／在菲律賓／過夜／煮咖啡的長夜／泡茶的手／也不見／誰來擦／孩子額上／種族的汗⁴¹

詩中所寄寓者與〈海外的窗前〉異曲同工。詩作處理的是華人在菲律賓的擔憂，深怕自己所謂的華人傳統淡化消失在菲律賓。詩中寫「在菲律賓過夜」，隨即以「煮咖啡的長夜」來寫於此地生活與習慣這裡主流的生活方式。但長夜煮咖啡也映照出不能寐的憂慮，令人憂慮的正是如同已不見的「猜拳的手」一樣的「泡茶的手」，只剩下「煮咖啡的手」。此詩可以用「泡茶」與「煮咖啡」兩種生活方式的此消彼長看出詩人的煩惱，所以最後特別點出「種族」，並以「誰來擦／孩子額上／種族的汗」回應詩中「誰來牽／我們的孩子」。然而，這種憂慮顯然是因為作者生活在菲律賓，並觀察且意識到這種被當地異族主流生活方式同化的趨勢，所以有如斯憂慮也正是因為生活於此，有些無奈，卻是當時不少華人在面對菲華社會轉型時的真實憂慮。

這種情懷亦可見諸1983年2月19日出版刊出《陽光小集》11期1983冬·春季號，若艾的〈講古〉則是談「王彬街」；兩詩異曲同工，一樣對菲律賓的「王彬街」又著複雜的感受，對於種族之別十分在意，「咱人」、「生番」等詞自然地出現在詩作中，隱然覺得自己是走不了的過客，覺得一生都只能在「王彬街」漂泊，回不去「家鄉」，想念的是聽說與想像中的「長城」、「黃河」。⁴² 同期刊出月曲了的〈悲蹄聲〉：

⁴¹ 月曲了，〈心事〉，《陽光小集》10期（1982），頁109。

⁴² 若艾，〈講古〉，《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3。

回途上／沿柏油馬路／路色的夜／趕車／馬車夫啊／夜風不寒人寒／
人在車上／車在異鄉／馬車夫啊／揚高一點吧／你手中的鞭／回途上
／嘈嘈的怒奔／好似長江急流／驚起的蹄／好似江外／痛楚的浪⁴³

詩中場景雖未明說，但「馬車」常常是馬尼拉被書寫的風景，即便到今日，從王彬街到王城，都還有人搭「馬車」觀光。詩中的關鍵詞就是「異鄉」與想像中的「長江」，因為始終覺得自己在異鄉，漂泊流亡，這就是為什麼「夜風不寒人寒」，也是為什麼回途上的怒奔，好似長江急流，驚起的蹄好似江外「痛楚」的浪。「痛楚」的其實不是浪，而是人，一如夜風不寒人寒。「回途」一語雙關，現實上回的是菲律賓的居所，但卻聯想到想像中的長江。與其先前刊出的〈海外的窗前〉互相呼應，寫的也是這種異鄉人情懷，無怪乎詩名為「悲蹄聲」，因為心中的「回途」回不去了。

有趣的是（林）泥水的〈馬車〉也是寫馬尼拉「王彬街」的場景，詩中呈現的情調懷舊，但卻毫無這種悲涼痛楚，呈顯不同的風景與氛圍：

晚風吹涼一襲黃昏／馱一車春意／輕輕然，篤篤然／擦過古意的教堂
／晚風，馬車，古院／牽連／小橋，流水，人家／沐浴十八世紀的幽
靜／點綴瘦馬破車／王彬像完美脫俗的古董／炫展在摩登都市／嚮往
懷舊原是老的現象／而我偏愛馬車／省油，無汙染／牽引時光倒流⁴⁴

這首詩以典雅流暢的文字寫馬尼拉的馬車，其中「晚風，馬車，古院」、「小橋，流水，人家」的構句可以看出借鑑了馬致遠《天淨沙·秋思》，然而內容所注重的傳統線索卻是「擦過古意的教堂」、「沐浴十八世紀的幽靜」，指涉的是菲律賓馬尼拉的傳統生活，詩中沒有種族的複雜矛盾，卻隱然寫出時代更迭中的新舊生活方式衝突，以極現代的環保意識提出懷舊的反思。而且懷舊的對象卻是在地馬尼拉的傳統，馬尼拉的王彬街。與若艾對困於王彬街的無奈，泥水卻是歌頌王彬街「像完美脫俗的骨董，炫展在摩登都市」。吳天霽〈跑過死亡〉的後記更是直接寫下「此詩乃紀念一位菲律賓田

⁴³ 月曲了，〈悲蹄聲〉，《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4。

⁴⁴ 泥水，〈馬車〉，《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5。

徑名將，在參加四百米競賽時，跑至終點後則告體力不支倒（地），終爾溘然逝世也」。⁴⁵

1983年8月30日出版刊出的《陽光小集》12期1983夏·秋季號則有王若的〈鍾斯橋〉，寫到菲律賓的巴時河，月曲了的〈老畫家之走〉則把呂宋島、臺北高雄、唐宋、敦煌、四川奇妙地結合；文志的〈看海的日子〉則提到馬尼拉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謝馨的〈車房旅社〉，這「車房旅社」其實就是臺灣所謂的「汽車旅館」，詩中除了以馬尼拉為主要場景所在，更用了菲律賓獨特的華文稱呼來反思種種現象，這正是作者發展在地詩作特色的主題與用語。內容雖以華文書寫，但不侷限於華人社會，而是跨越族裔的菲律賓現代社會觀察，甚至能跨越國境洞悉現代社會現實情境，因而特別值得討論：

許多詞彙的定義你是永遠猜不透的／在猥瑣的年代——／疲憊的旅客
下了馬找不到投宿的地點／從未嘗過流浪滋味的人卻滿是風塵／當
然，他們都是抱著／行萬里的壯志／闖江湖的雄心。甚至／無懼於違
反交通規則／紅燈亮時／他們就閉起眼睛／一些閨秀們／也好奇地站
在懸崖邊緣／想著沈船的故事／想著一失足成千古恨／想著深似海的
後門。可是這／都是屬於過去式的抒情了，它們說／在馬德里／黑色
的沙灘找不到一隻船／在馬里蘭／新潮的人兒睡在水做的床上／在馬
尼拉比較起來是保守得多了——／花花公子猶不能公開沿街展示／他
們的車依然悄悄地停在車房裡／他們的門依然緊緊地關著⁴⁶

開篇首段就點出詞彙的歧義，挑明討論「猥瑣」的年代，並由此生出後兩句詩的矛盾與精彩。疲憊的旅客找不到投宿的地點，暗示了這車房旅社並不真的是為疲憊的旅客投宿而準備。後一句「從未嘗過流浪滋味的人卻滿是風塵」，「風塵」一詞雙關，本是因旅途的奔波勞累而滿身風塵，亦衍指為娼妓。回應了前一句，因為車房旅社服務的對象並非來自遠地的旅客，更是為了這「猥瑣」的年代（「猥瑣」的人）而生。接著寫來「車房旅社」的

⁴⁵ 吳天霽，〈跑過死亡〉，《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2。

⁴⁶ 謝馨，〈車房旅社〉，《陽光小集》12期（1983），頁168。

「他們」抱著「雄心壯志」無懼於違反交通規則，閉起眼睛闖「紅燈」。「紅燈」有「紅燈戶」的影射也指涉危險，但這些「雄心壯志」卻無懼違反規則，也暗示了其中的刺激與不法。接著寫好奇地站在懸崖邊緣的「一些閨秀」的三層想像：「沈船」、「一失足成千古恨」、「深似海的後門」，把極老套的規勸暗喻並排於此，並將成語中的「侯門」置換成「後門」，暗示其中的祕密、隱晦、不可告人，在此文本脈絡中有了奇異的新鮮感。接著話鋒一轉，表示這已是「過去式的抒情」了，因為這馬尼拉的「車房旅社」，車悄悄停在車房裡，門緊緊關著，相比在馬德里、馬里蘭花花公子公開沿街展示的露骨，保守地多。謝馨此詩寫馬尼拉當時的現實生活，婉轉幽默中藏有文字與思想的新鮮、機鋒與批判，更饒富詩趣地把漢字中同樣以馬開頭的三個字國際城市相比，指出馬尼拉在其中相對的優雅。謝馨於此從容地將詞彙的歧異雙關發揮得淋漓卻含蓄幽默，全詩不見性與色情的直接描述，卻滿是性與情色的氣味，詩趣滿溢，也完全契合現實生活的觀察。

對照吳天霽的說法，可以發現《陽光小集》「菲華詩展」中，已逐漸發展出別於當時臺灣詩作的作品與主題，呈顯了「菲律賓」的經驗。作品有注意並發展「菲律賓」在地經驗者又可分為兩支：一是如1920年出生的（林）泥水、1927年出生的林泉、1938年出生的謝馨、1940年出生的吳天霽等詩寫菲律賓有「回歸現實」，以「菲律賓」為依歸的傾向，將關懷的視野放回自己實際生活的菲律賓土地上；一是如1920年出生的若艾、1941年出生的月曲了等寫菲律賓，雖然長期生活在菲律賓，卻是自居為無奈的過客，以「菲律賓」為異鄉，雖也書寫菲律賓，卻常是用來映襯甚或推崇想像中的「中國」，藉以思鄉懷鄉。

如此看來，詩展中的詩人是否「回歸現實」，揚棄流落異鄉的漂泊無奈，未必能以世代為區分，而更與詩人個人的品味、個性與思考有關。但的確能看到詩展中有相當數量的菲華詩人表現出「回歸現實」的傾向，極具自覺地發展菲律賓在地現實與歷史的詩作。這種「回歸現實」的傾向，可以說因為「菲華詩展」的框架誘發，也可以說在菲律賓戒嚴時（1972-1981），菲華文藝圈無法出版華文報刊，但仍舊持續吸收臺灣文學文化的新思潮，也常投稿至臺灣的刊物發表所致。換言之，菲律賓戒嚴時，菲華文藝圈最重要的華語語系文化資源依舊是臺灣，這亦可從王國棟1979年（菲律賓仍處戒嚴時），帶領耕園文藝社組團至臺灣訪問一事，推知當時菲華對於臺灣的文藝

思潮與社會脈動，是積極地吸納與觀摩，與臺灣文學文化圈的連結不斷。而1970年代正是臺灣戰後世代因為一連串的外交挫敗而覺醒轉化，逐漸揚棄流亡漂泊心態，不分省籍構成「回歸現實世代」，積極關懷政治社會事務與國家前途，或挑戰政治體制、或重構文化趨向，是戰後臺灣文化政治變遷的軸心時期的核心角色。⁴⁷ 我們若進一步思考「陽光小集」的創作走向與定位，或許更能彰顯「菲華詩展」的意義與價值。

林貞吟曾在其〈現代詩的街頭運動——《陽光小集》研究〉指出《陽光小集》的兩條創作走向是「關懷現實」與「擁抱大眾」。⁴⁸ 向陽自己多年後回顧也指出當年《陽光小集》的創作走向，不只是有計畫地朝向世俗化、大眾化發展，也同時進行著本土化、多元化的論述與實踐。⁴⁹ 核心價值就如其在〈在陽光下挺進——詩壇需要「不純」的詩雜誌〉一文中所言：

我們寧可踏實地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寧可磊落地站在詩的開放的陽光下，種植各種花草、欣賞各種風景——我們不強調信條、主義，不立門派，不結詩社，不主張某種來自某時或某空的「繼承」或「移植」。我們不求「純粹」辦一份專門為詩人辦的詩刊，但願「不純」地為詩壇開闢一到活水，為關心詩的大眾提供一份精神口糧。以詩為中心，嘗試各種藝術媒體與詩結合的可能，嘗試詩非「國土」，只是一份媒體的可能，嘗試反應而非引導的可能，嘗試詩人非人類精神的貴族或遺族、而只是文化大花園中某塊有極限的小花園的可能。⁵⁰

所謂「不主張某種來自某時或某空的『繼承』或『移植』」、「不求『純粹』辦一份專門為詩人辦的詩刊，但願『不純』地為詩壇開闢一到活水，為關心詩的大眾提供一份精神口糧。」與「嘗試反應而非引導的可能」其實都

⁴⁷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⁴⁸ 林貞吟，《現代詩的街頭運動——《陽光小集》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⁴⁹ 向陽，〈烏雲終有散盡時《陽光小集》的聚散離合〉，《文訊》378期（2017），頁99。

⁵⁰ 向陽，〈在陽光下挺進——詩壇需要「不純」的詩雜誌〉，頁7-8。

與「關懷現實」與「回歸現實」同調。而對於「踏實地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對於「菲華詩展」這四字有創作自覺的菲華詩人，自然會有意識要發展出「菲華詩展」的價值與意義，尤其是在《陽光小集》「菲華詩展」刊出的價值與意義。故，若是生活在菲律賓，「踏實地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就很自然地轉化成「踏實地站在菲律賓這塊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對照前面分析「菲華詩展」的詩作，的確可以看到不少優秀的詩作，更有幾位優秀的菲華詩人，不再耽溺於華人離散漂泊的想像，而是回歸現實將關懷的視野放回自己生活的菲律賓土地上；不論是以菲律賓的歷史、原住民文化甚至當代跨族裔社會的觀察入詩，都充滿對所在土地的思考並發展出迥異於臺灣詩作，作為菲華詩作獨有的主題內容。然而，這種「回歸現實」的創作走向，在「菲華詩展」中雖非全面呈顯，但已開風氣，突破窠臼，意義非凡。值得注意的是，菲華文藝因菲律賓戒嚴（1972-1981）而休養生息的約莫十年，正是臺灣1970年代「回歸現實」世代與風氣的構成，若究其時序與實質交流，實不能不說是與臺灣創作思潮與文化脈動的共振。如是觀之，菲律賓解嚴後迎來的菲華文藝復興，其中最先復刊，堪稱當時菲華文藝領頭羊的「耕園」與當時臺灣最具活力的年輕詩社「陽光小集」結盟，推出「菲華詩展」，使部分菲華詩人「回歸現實」，發展出迥異於臺灣之菲華獨有的主題內容詩作，實際上也與臺灣文學文化發展的風氣合轍，可說是接榫臺灣「回歸現實」思潮的具體呈現。

四、餘論：由街頭走向國際

發行《陽光小集》的「陽光小集」詩社，成立於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與臺美正式斷交之後的1979年11月，因為在轉型後有計畫地朝向世俗化、大眾化發展，也同時進行著本土化、多元化的實驗與實踐，辦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創舉，相對於其他詩刊顯得格外不純，有活力也有衝撞力，故被定位為現代詩的街頭運動，或亦可象徵性地稱其為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街頭」也正是相應於對現實的肯認、對大眾的擁抱。這自然也呼應著臺灣文學文化在一連串內外衝擊刺激下的蛻變轉型。然而，卻鮮少人注意《陽光小集》與菲律賓進行跨國姊妹社的締結，也沒有留意竟有如此規模與密度將近一半的刊

數刊出「菲華詩展」，以及這跨國結盟與「菲華詩展」在臺灣文學置入國際／世界中的意義與價值。

以華語語系的視角觀之，這非但證明了臺灣文學場域在華語語系中的獨特位置，也關拓了臺灣文學經由華語語系和其他國家地區連結的論域。相較於馬華文學在臺灣文學論域的重量，不論是在臺與否，都與臺灣文學場域息息相關。這些刊載於《陽光小集》的「菲華詩展」，不但有菲律賓文藝社團的正式結盟，還有作品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此「菲華詩展」刊出結束後隔年的座談會，如吳天霽與王禮溥等菲華作家更深刻地反思「菲華」現代詩的特色，是否有發展出別於臺灣的題材或風格。而在菲律賓解嚴，菲華文藝復興伊始就締結的聯盟，以及與之相伴「菲華詩展」平臺，也讓其中幾位重要詩人自覺地「回歸現實」，從「踏實地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轉化成「踏實地站在菲律賓這塊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讓部分菲律賓華語語系的詩作轉向對現實的肯認、對大眾的擁抱，逐漸展現獨特的聲嗓與色彩，而非純然地模習臺灣文學主流的題材與風格，更是意義非凡。從另一角度思考，這些在臺灣詩刊發表的菲華詩作，若將其視為在臺菲華文學或寬泛的臺灣文學，都是臺灣文學史與臺灣文學研究迎向世界，進行闡連與參照的機會。

臺灣文學刊物《陽光小集》中「菲華詩展」展出的作品有不少凸顯出菲律賓特色，這自然連結了臺灣與菲律賓的文學場域。也讓臺灣文學有了「菲律賓性」。從另一角度思考，這也使臺灣文學與菲律賓文學在南島語系之外，有了另一面向的關連。事實上，臺灣文學刊物中「菲華詩展」不限於《陽光小集》，但論規模與密集度《陽光小集》仍是空前，尤其在臺灣解嚴前，在十三期中這樣連續六期的「詩展」真的是難能可貴也絕無僅有的詩展。若純以華語語系的影響思考，在《陽光小集》之前，臺灣的現代詩就以「現代主義」的特色深刻影響菲華現代詩。不過，在菲律賓軍統戒嚴後的菲華文藝復興，也接連受著臺灣文學文化的轉型「回歸現實」，逐漸尋找並發展自己的特色。若將視野置入冷戰結構，也可藉此觀察冷戰中文藝交流與社會脈動的連帶關係，也是高壓統治下文學文藝跨國結盟甚至突圍的可能範例。臺灣文學刊物《陽光小集》中的「菲華詩展」就是一個具體縮合闕限與踰越的關鍵空間。從另一角度切入，這也是將臺灣文學放入國際華語語系中加以考察，思考其既在地又國際雙向視野與實踐的經典範例。

附錄一

《陽光小集》所刊「菲華詩展」

作者	篇名	卷期
莊垂明	〈前言〉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若艾 (吳湧泉)	〈羞澀〉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林泉 (劉德星)	〈慰〉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林泉 (劉德星)	〈死神〉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林泉 (劉德星)	〈PANGKAT KAWAYAN〉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夏牧 (陳鴻山)	〈詩〉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夏牧 (陳鴻山)	〈玫瑰曲〉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艾鴻 (蔡偉民)	〈中年〉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艾鴻 (蔡偉民)	〈果樹〉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莊垂明	〈水缸〉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莊垂明	〈雞屎〉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莊垂明	〈小鳥〉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莊垂明	〈債〉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1982年5月19日菲華耕園文藝社與臺灣「陽光小集」詩社結為姊妹社，雙方代表簽屬合同。		
林驪	〈簡介菲華耕園文藝社——從創立經過至未來展望〉	1982春·夏季號
靜銘	〈年華〉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靜銘	〈年華〉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許露麟	〈妻的肚皮〉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作者	篇名	卷期
許露麟	〈成就〉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許冬橋	〈風屋〉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許冬橋	〈卜居〉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和權	〈塔〉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王若 (王國棟)	〈探藏者的悲哀〉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月曲了 (蔡景龍)	〈海外的窗前〉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月曲了 (蔡景龍)	〈天色已靜〉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墨客	〈回音〉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林泉 (劉德星)	〈星光下的遐想〉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吳天霽	〈射殺夕陽〉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夏牧 (陳鴻山)	〈影子〉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文志 (施文志)	〈落日〉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謝馨	〈蝴蝶結——給祝頌〉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謝馨	〈王彬街〉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林泉 (劉德星)	〈走索者〉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莊垂明	〈蒼龍〉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莊垂明	〈山的那邊〉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月曲了 (蔡景龍)	〈心事〉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王若 (王國棟)	〈昨天〉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作者	篇名	卷期
吳天霽	〈跑過死亡〉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若艾 (吳湧泉)	〈講古〉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月曲了 (蔡景龍)	〈悲啼聲〉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和權	〈美麗的園徑〉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林泉 (劉德星)	〈相簿〉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泥水 (林泥水) 1929-1991	〈馬車〉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許露麟	〈華西街小吃〉 之一：魚 之二：蟹 之三：鴿子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許露麟	〈華西街小吃——蛇〉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許露麟	〈抽煙記〉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王若 (王國棟)	〈鍾斯橋〉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夏牧 (陳鴻山)	〈忘憂草〉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莊垂明	〈深夜〉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白雁子	〈田疇夜色〉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吳天霽	〈鄉情〉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月曲了 (蔡景龍)	〈老畫家之走〉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和權	〈飯鍋〉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墨客	〈昨日〉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作者	篇名	卷期
謝馨	〈車房旅社〉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文志 (施文志)	〈看海的日子〉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和權	〈蝦〉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許露麟	〈水泥〉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吳天霽	〈機器人〉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林泉 (劉德星)	〈西湖泛舟〉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寒松	〈下午茶〉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佩瓊	〈盲人說〉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若艾 (吳湧泉)	〈一半一半〉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若艾 (吳湧泉)	〈狂啃臺北〉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附錄二

陽光小集第八期後幾個與菲華有關的觀察

	是否有列菲律賓聯絡處	菲華背景的編輯同仁	菲華背景的贊助同仁
《陽光小集》8 1981冬季號 19820220 出版刊出	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		
1982年5月19日菲華耕園文藝社與臺灣「《陽光小集》」詩社結為姊妹社，雙方代表簽屬合同。			
《陽光小集》9 1982春·夏季號 19820625 出版刊出	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		莊垂明
《陽光小集》10 1982秋季號 19821031 出版刊出	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	王國棟、許露麟	莊垂明
《陽光小集》11 1983冬·春季號 19830219 出版刊出	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	王國棟、許露麟	亞薇、和權、蘇子、 莊垂明
《陽光小集》12 1983夏·秋季號 19830830 出版刊出	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	王國棟、陳默、 許露麟	亞薇、和權、蘇子、 莊垂明、寒松、墨客
《陽光小集》13 政治詩專輯 19840604 出版刊出	菲律賓聯絡處／王國棟	王國棟、陳默、 許露麟	若艾、和權、亞薇、 莊垂明、蘇子、 寒松、墨客

引用書目

- 月曲了，〈海外的窗前〉，《陽光小集》9期(1982)，頁149。
- ，〈心事〉，《陽光小集》10期(1982)，頁109。
- ，〈悲蹄聲〉，《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4。
- 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
- 王勇，〈再現「陽光」〉，http://ningkuei.blogspot.com/2015/11/blog-post_7.html (2024.04.25徵引)。
- 王國棟，《芥蒂集》(馬尼拉：王國棟文藝基金會，2018)。
- 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對臺灣文學的可能意義：為《中外文學》「華語與漢文專輯」所寫〉，《中外文學》44卷1期(2015)，頁135-143。
- ，〈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2018)。
- 向陽，〈在陽光下挺進——詩壇需要「不純」的詩雜誌〉，《陽光小集》10期(1982)，頁7-8。
- ，〈熱鬧非常，意義重大——一九八二年現代詩壇十大事件〉，《陽光小集》11期(1983)，頁7-17。
- ，〈烏雲終有散盡時《陽光小集》的聚散離合〉，《文訊》378期(2017)，頁99。
- 吳子文，〈僑生教育與中華民國：臺灣國族想像的轉變，1951-2008〉，《文化研究》10期(2010)，頁108-138。
- 吳天霽，〈射殺夕陽〉，《陽光小集》9期(1982)，頁152。
- ，〈跑過死亡〉，《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2。
- ，〈家在千島上〉，《創世紀詩雜誌》68期(1986)，頁92。
- ，〈跨世紀詩選〉(菲律賓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2008)。
- 李盈慧，〈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暨大學報》1卷1期(1997)，頁165-194。
- 李瑞騰，〈菲華新詩的一些考察〉，《香港文學》80期(1991)，頁34-40。
- ，〈東南亞華文文學在臺灣〉，《文訊》79期(1992)，頁36-40。
- ，〈菲華現代詩中的華人處境〉，楊松年、王鼎康主編，《東南亞華人文學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出版社，1995)，頁1-10。
- ，〈我在菲華文學領域的探索〉，《中央月刊文訊別冊》2卷142期(1997)，頁8-9。
- ，〈菲華散文的文化屬性——以選集為考察對象〉，《文訊》284期(2009)，頁56-61。
- 邢光祖，〈追憶在菲二十年的文藝活動，(上)〉，《文訊》24期(1986)，頁121-138。
- 泥水，〈馬車〉，《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5。

- 和權，〈菲華詩壇近況〉，《文訊月刊》24期(1986)，頁195-196。
- 林泉，〈PANGKAT KAWAYAN〉，《陽光小集》8期(1981)，頁68。
- 林貞吟，《現代詩的街頭運動——《陽光小集》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林驩，〈簡介菲華耕園文藝社——從創立經過至未來展望〉，《陽光小集》9期(1982)，頁142-144。
- 若艾，〈講古〉，《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03。
- 洪淑苓，〈菲華現代詩中的「華」文化與在地經驗——以雲鶴、和權、謝馨詩作為例〉，《中國現代文學》35期(2019)，頁89-112。
- 范雅梅，〈去祖國：二次戰後國民黨僑務政策中的地緣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2期(2011)，頁137-177。
- 莊垂明，〈蒼龍〉，《陽光小集》10期(1982)，頁108。
- 張雪映，〈一九八二年詩壇記事〉，《陽光小集》11期(1983)，頁18-26。
- 陳鴻瑜，《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臺北：三民，2018)。
- 雲鶴，《沒有貓的長巷》(臺北：秀威，2010)。
- 楊宗翰主編，《交會的風雷：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集》(臺北：允晨，2018)。
- 楊錦郁紀錄，〈菲華文學的困境與突破〉，《文訊》24期(1986)，頁62-78。
- 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臺灣境遇為例〉，《臺灣文學學報》30期(2017)，頁81-110。
- 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臺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卷1期(2015)，頁25-62。
- 趙萌鈞，《戰後在臺菲華小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 謝馨，〈王彬街〉，《陽光小集》10期(1982)，頁106-107。
- ，〈車房旅社〉，《陽光小集》12期(1983)，頁168。
- 菲利浦·鮑靈(Philip Bowring)著，馮奕達譯，《現代菲律賓的誕生》(臺北：時報，2024)。